责任编辑：戴菁　E-mail:daijing314@163.com　电话：010-62805132　　2014年2月24日

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三中全会

——访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柳建辉

编者按：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党的历届三中全会都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推出一个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改革举措和战略决策。所以，“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专有政治语汇，几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代名词。就历届三中全会都贯穿了一个至今不变的主题即“改革”这一话题，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柳建辉。

□本报记者　张　婷　戴　菁

记者：回首中国这30多年的改革历程，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请您先简要解读一下历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词和关键词。

柳建辉：我们从每次三中全会的主题和关键词，就可概要地看出改革开放的发展脉络和逐步展开深入的历史线索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的重大决策和举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和关键词是“工作重点”“转移”“改革”“开放”等，尽管“开放”这个词在全会公报中还没有使用，但强调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很明确。所以，人们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的新时期。从那以后，历届三中全会的议题都聚焦于如何深化和推动改革开放，大的主题始终没变，只不过涉及的改革领域不完全相同而已。

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研究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的主题和关键词，集中起来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使“商品经济”这个词第一次写入党的全会文件。1988年9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把1989年和1990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它的主题和关键词是“治理整顿”。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更加重要，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它的主题和关键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等。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农村改革。会议总结农村改革20年的基本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键词是“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等。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主题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关键词是“完善”“统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经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这三次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文件，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逐步发展、深化，是很重要的。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题和关键词是“农村改革创新”“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经营权流转”等。

以上这七次三中全会都是研究部署宏观领域或某一方面的重大改革，都是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核心的。所以，我们才说它们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上述三中全会和十八大精神的基础上，面向新的世纪和新的历史起点，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造福人类社会的高度，所召开的一次中外瞩目、国人期盼，在宏观领域和顶层设计方面通过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为目的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



记者：那么，纵观这30多年来的改革，您觉得改革呈现怎样的历史特点？

柳建辉：第一，新时期改革的推进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同步进行的。这既是改革的方向问题，又是改革的理论指导问题，也是改革的经验和特点。进一步说，从总体上看，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新时期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随着党的理论创新，改革的指导思想越来越明确，方向越来越清晰，措施也越来越得力，效果越来越显现。反过来，改革又进一步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使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地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深入人心。

第二，新时期改革既是循序渐进的，又是逐步深入的，二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这个特点也非常明显，就是说我们的改革不是孤军奋进，而是协同推进的；不是一时的草率行为，而是科学研究，有重点、分步骤，一步一步推向深入的。如果上一条特点说的是改革是有理论指导的，这一条实际上是说，改革是有国情基础的、是从实际出发的（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出发），是循序渐进与逐步深入、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辩证统一过程。根据国情，什么阶段解决什么问题最有利，渐进式改革就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改革没有力度，或者停步，而是说改革是在不断的渐进深入过程中体现改革的力度、广度和深度的，既不急躁冒进，又不停步不前；既不瞎折腾，又不动摇和懈怠。

第三，新时期改革是在不断总结群众智慧的过程中探索前进的，人民是推动改革的主体。从这个角度通俗地说，改革的确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但又不是盲目的，实际上是在不断总结群众智慧的过程中探索前进的。也就是说，改革是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改革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和措施的提出与实施，都是群众的创造和推动。从严格意义上说，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当改革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时候，党和政府总是依靠人民群众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上升，通过群众的实践和反映来决定改革举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改革既是不断探索的过程，又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大力支持的过程。只有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可承受能力和心理预期、获得人民认可的改革，才是科学的、持续的、协调的、立得住的改革，也才可能会是真正的改革。这是新时期改革的又一条重要经验和启示，也是一个重要特点。任何一项改革，其成效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就改不下去。正像李瑞环同志所强调的，改革和决策要“坚持把握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群众可承受的程度三者的关系”。

第四，新时期改革紧紧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进行。这个特点的意思很明确，即新时期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走的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从总体上改善了民生，发展了民主，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也得到了加强。尽管伴随着改革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有的还很严重，但应该说改革的成效对未来的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并还会产生出深远的影响，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

第五，新时期改革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融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轨道，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化潮流。毋庸讳言，中国的改革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也借鉴了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吸取了先进科技成果，并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科技创新。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融合中，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发展。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的发展，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记者：您认为这30多年的改革给我们哪些经验启示？

柳建辉：第一，改革“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这实际上就是说，改革之所以走到今天，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根本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经验启示我们，改革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二，改革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理论指导，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开辟新路。这条经验确保改革的思想始终符合实际，而不偏离正确轨道。

第三，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这实际上讲的是改革的主体问题，即人民大众作为改革的主体，推动着改革、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只有发挥好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改革才能持续下去。这条经验强调的是作为执政党，做任何工作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反映群众的诉求，回应实践的呼唤。

第四，改革要“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这条经验实际上就是论证改革的科学性与改革的外部环境关系问题，而这30多年的改革证明，我们恰恰处理好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是改革的前提，也是一个重要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改革不能保证国家稳定的大局，就持续不下去，苏东剧变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仅仅为了稳定，但改革决策不科学、改革力度和步子不大、改革的系统性和统筹规划做不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把握不准的话，改革也就很难广泛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而只会半途而废，举步不前，最终失去人民的支持。

学者访谈

经世致用治学精神的当代传承

□王道勇

在当代中国，处于所谓“显学”地位的各类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都具有特别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富民、报国、咨政和不尚空谈等经世致用治学精神，也因此在学界非常盛行。但是，传统的经世致用治学精神是否完全适应当代社会还值得商榷。记得学者刘梦溪与余英时两位先生曾进行过一个题为《“经世致用”的负面影响》的对话，刘梦溪先生就直接指出，经世致用之学过于强调学术的手段性，忽视了学术本身也可以是目的，过于强调经世致用治学精神造成了传统中国的学术一直没有独立性。此言似乎正中传统经世致用治学精神的要害，一时间击掌赞叹者有之，起而驳斥者亦有之。如何恰当地将传统的经世致用治学精神融入当下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中，就成为重要的学术议题。

回溯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经世致用治学精神与转型社会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和亲和力。概言之，经世致用之学主要兴盛于四个时期：一是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中的儒、法、墨家均是“入世之学”，道家虽谈无为而治，但也并非逸世之学。二是南宋中后期，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功利主义为利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谈”大加鞭挞。三是明末清初时期，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等为代表的学者，成功地使经世致用治学精神融入主流学术界。四是近代中国，在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无论是洋务派还是共和派，无论是强调儒家回归还是欢呼西学东渐，甚至是主张全盘西化，所有政治家和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治学都以社会诊断学为基础，希望自身的学问能切中时弊时疾，以实现报国为民的目标。以上四个时期或是社会形态的彻底转型时期，或是外族入侵家国危难时期，或两者兼而有之。可见，国家和社会出现巨变之际，也是经世致用之学兴起之时，而此时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也就会得到学者们的格外推崇。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成就千年未有，国家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当代中国面临着三种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及农业社会直接向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的转型。可以说，能否再现汉唐盛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就看这一两代人的实干。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时期，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就是，经世致用治学理念和方法理应大兴于天下，在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得到传承和发挥光大。

但是正如刘梦溪和余英时两位先生所忧虑的，传统的经世致用治学精神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窃以为，经世致用治学精神要在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得到传承和发挥光大，治学者至少要解决好三个基本问题：“本”“真”和“心”。

一是“本”，即治学者要依托于“本问题”来展现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解决好治学者与学科的关系问题。对一个学科本问题的思考，是关涉该学科理论和整个知识体系构建的元思考。强调治学的经世致用性可能会让治学者对一些看似与现实没有直接联系的学科根本问题进行有意识的回避甚至是摒弃，从而让经世致用之学更多地关注中层问题，甚至是全心扑在具体问题上。实际上，明末清初之际，在经世致用治学精神的指引下，学者们着重研究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但“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正是这种对本问题的深度追寻，才使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经世之论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如果不对本学科元性质的本问题进行关照，则必然会缺乏深思，一定会被戴上功利之学、庸俗之学、务实之学甚至是肤浅之学的帽子。因此经世致用色彩最重的社会科学，必须对诸如经济人、权力、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等基本问题有深入的认识，唯有如此，经世治用治学精神才能找到其精神的皈依之所。

二是“真”，即治学者要抓住“真问题”来实现经世致用目标，解决好治学者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决定经世致用治学精神能否传承和发展的关键在于治学者要有问题意识。在经济社会急遽转型时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只有抓住时代的“真问题”，做出来的学问才是“硬通货”，才能在政府和老百姓那里通行无阻，才能做到入方家之眼、入民众之心。一项研究成果是否抓住了“真问题”，应当接受各项检验，如应用性研究成果要以实践效应为检验标准，而宣传性成果则要以理论化和大众化程度作为检验标准。

当然，能否抓住“真问题”需要一个学习过程，治学者要有务当世之急和勇于任事的精神，也要有创新思维，还要注重对现实社会的调查认知。这些要素有机结合后，治学者虽然仍然会有“众里寻他千百度”之苦，却能得到“蓦然回首”发现“真问题”的回报。

三是“心”，即治学者要形成并坚持自身的治学价值观，解决治学者与内心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的治学者在治学价值观方面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一方面认为学问应当有实用性，这其中既有传统学者那种“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心态，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另一方面认为学问应当有独立性，受自然科学影响认为治学要不受外界影响探求真理，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认为治学要有追随内心意志获得真正的安宁自由。最为吊诡的是，这些明显对立的治学价值观可能是并存于同一个学者的内心之中。

应当声明的是，在社会科学的治学过程中，并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韦伯首倡价值中立时，并不是要学者们做一个不沾人间烟火的神仙或者成为真理的守护神，他以为在研究准备、研究过程和成果运用这三个方面，仅在研究过程中要做到不带偏见，公正客观地得出结论，而研究资料和方法的选择、研究成果的利用等过程必然是有价值关涉的，所以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更多的是强调研究的科学性，而不是现在个别学者所强调的学者完全独立，甚至是与主流社会“唱反调”。“经世致用”四字本身就说明，秉承经世致用治学精神的治学者不可能做到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因为“经世”强调经国济世和家国关照，而“致用”则强调学以致用和学用结合，两者都必然让自身的价值观深涉其中。但治学者可以通过关注研究的科学性来做到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即通过注重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得出科学结论并加以利用，实现为国利民的目标。

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中国这一代学者是最幸福的，也是最不幸的一代学者。说“幸福”是因为我们面临着急速转型的社会，大量新活的社会事实和国家的快速复兴为学术创新和实现经世致用目标提供了无限可能的空间。说“不幸”是因为治学者紧赶慢赶却永远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无法提出能数十年长期适用的应用性对策。但是我想，治学者只要具有问题意识，抓住“本”问题和“真”问题，解决好“心”的问题，经世致用治学精神在当代中国一定会获得充分表达的机遇，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传承和振兴。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社部）

学术评论

毛泽东的学习观

□袁明华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观。首先，毛泽东在我党历史上很早就认真关注和研究学风问题。他揭示了学风的本质和内涵：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他把学风纳入党的建设的理论框架，指出学风也是党风，并且学风是“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问题”，把学风问题摆在党领导中国革命“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的位置上。其次，毛泽东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他在运用马列原理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明确地把理论联系实际确定为党的学风，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学风观，为党的学风建设奠定了基石。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再次，毛泽东同各种不良的学习风气作坚决斗争，特别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还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从理论上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于纠正党内不良学风、改造全民族的学习起到了正确的引导作用。

学用统一观。在毛泽东看来，“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学习”。学和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学是基础，用是目的，用也是学习的过程，学习是为了将学到的知识观点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更好地改进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即学而能用，学而会用，学用统一，不可脱节。他形象地指出，学习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尖锐地批评一些同志，学习目的不明确，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完成任务而学习，停留在单纯的学习上，所以书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他嘲笑这种学而不用的人只不过是“古董鉴赏家”而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就擅长学以致用，如他一生酷爱读史，对中国古典文学颇具研究，并能借鉴其中历史经验，来救国治国平天下，他还常常古籍新解，活用古籍名著中的地名、人物、语言，来为现实政治服务，这种活学活用的精神，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全民学习观。今天全民学习已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文化目标。而这种思想萌芽在毛泽东的学习观中早已有之。他从战争年代起，就十分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启蒙教育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号召人人都要努力学习，并针对不同对象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教书育人的知识分子要继续改造，并且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年轻人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习成年人已经学会的许多东西；农民要抓紧识字学文化，以适应从事生产劳动的需要；广大干部应把工作以外的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上，形成学习上你追我赶、比学赶帮的好风气。毛泽东在强调学习时，着重针对党的领导干部，指出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他们是否学习以及学习的好坏，对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强调各级党政领导要带头学习，成为群众的表率。此外，他还提出，学无止境，一万年以后还要学习。

全面学习观。首先，在认识的来源上，毛泽东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甚至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有字之书”更重要。“无字之书”就是群众，就是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在许多讲话和谈话中，他引用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反复说明一个道理：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知识，这是最丰富生动的知识。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提出要多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民众百姓学习，才能成为既掌握了书本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比较完全的知识分子。其次，在学习的对象上，毛泽东主张，无处不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要学习和研究当代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既提出“要向古人学习”，做到“古为今用”；又发出“向外国人学习”的口号，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做到“洋为中用”。最后，在学习的内容上，毛泽东认为，学习要有宽度，要博览群书，有一定的知识面，构建一定的知识结构。包括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作者系江西省鄱阳县委党校副校长）